

秋访澳洲

应澳大利亚澳中理事会(Australia-China Council)、联邦科学工业组织(CSIRO)的邀请,我于2007年春天降临之时,有幸赴澳洲进行了为期十天的工作访问。此时正值南半球的秋季,由于遭受百年不遇的旱灾,澳洲的气候类似夏秋之交。这就意味着,如果以后没有机会再去南半球的话,那么2007年我将多过一段夏秋之交,想来有点不可思议。

澳中理事会成立于1978年,是澳政府为了加强与中国相互理解,增强两国人民关系的官方组织。联邦科学工业组织类似中国的科学院,为澳洲国家级的最高科研机构。David Jupp(中文名字叫贾大卫)是国际上知名的数学家,在澳洲时听一位同事讲,他的工作笔记至今仍是几位后来的同事当作标准答案,还在不断的练习。大卫由遥感而及蜀道研究,已经做出了许多超前的研究成果。他自然是“3S技术在汉中名胜古迹保护与利用的应用”合作课题的主要负责人,也是代表澳中理事会邀请赴澳者。与我同行的是中科院水土保持研究所所长李锐教授。他曾在1984~1986年赴澳洲科学工业组织进修并合作研究,此后亦曾多次主持与澳方在遥感信息方面进行课题合作,至今仍然绵延不断。李教授主编5部专著,发表60多篇论文,是我国著名区域水土因保持学家和遥感信息专家。有了他,澳洲之行无论是英语交流还是对澳洲风情的了解,我耳闻目见的自然不在少说,更何况我所担心的几乎从老师那里学到又全部还给老师的瘪脚的英语,有了他而有些自以为是。尽管时间短暂,我们在澳洲只是走马观花、蜻蜓点水般,似乎无法触摸这个骑在羊背上国家跳动的脉搏,但依然看到了澳大利亚这个南半球富裕国家的方方面面。

一、国旗在这里飘扬

在贾大卫的精心筹划下,15日我们驱车百里而外的著名度假胜地——南海岸,除领略这里迷人的海滨风光外,就是访问著名汉学家,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雷夫·德克雷斯基先生(Rafe de Crespigny),他的中文名字叫张磊夫。

南海岸位于堪培拉与悉尼之间,濒临大海,蔚蓝的天白白的云,高高的树绿绿的草,以及深蓝色的海,构成了如花似锦、风景迷人的旅游度假胜地。这里是澳大利亚人夏季常往的地方,也是65岁以后退休的教授、名人居住的地方。他们的房子多分布在海边,独家散居,又深藏在密林之中,这些人沐浴在大自然的怀抱之中,生活的滋润程度可想而知。出发之前,大卫花了很长时间准备资料,包括我们要拜访的这位汉学家地址。贾大卫亲自驾车行驶,在路上绕来绕去,找什么高地,几经曲折才由小径驶入。这个地方“偏僻”的,游人甚至连当地人找起来也会有一定的难度。车甫停,一位身穿红T恤、短裤,灰色袜子高高到膝盖处的老人微笑迎上来,很显然他就是这家的主人——我们要拜访的著名汉学家张磊夫先生,不过初步印象其貌实在不扬。

主人告诉我们,为了迎接我们的到访,特意在院子悬挂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

只见一面国旗,在微风的吹拂下,露出了五角星。

磊夫的房子紧邻大海。三面都是如荫的桉树,像三堵墙一样包裹着这座房子。邻海一面种植了绿地,由此看到深蓝色的海,澎湃的浪,以及海中的独岛。主人请我们到阳台,女主人张宝慈便滔滔不绝地说起来,自然她是十分热情好客,或者说与大卫极为熟悉。她们夫妻二人曾多次访问到中国,最有印象的是1973年,他们从北京出发,经洛阳、三门峡,再到成都、重庆,那时所经之处是一片红色的海洋;再有一次是1981年,他们取道香港,先后游览过杭州、苏州等地,改革开放给这块神奇的土地带来的天翻地覆的变化。这位女士极其健谈,磊夫先生也只能静坐在椅上,时不时地点头而已。不久她因有他事而离开。

或许磊夫先生看到这样的寒暄还算不上学术层面,他特意邀请我们去他的书斋。他的书房邻海一面是由完整玻璃装成的墙,与阳台所见相同,其它三面则是从地面到顶棚的书架,插满了各式各样、各种语言的书籍,还悬挂着蒋彝先生隶书条幅,用坐拥书城来说那是一点不过分的。我出访之前查阅相关资料,得知他曾是国立大学中文中心负责人,研究范围是汉代至今中国的历史和地理。但磊夫却介绍他是研究中国东汉至三国时期的历史,拿着他费尽心血的《东汉三国历史大辞典》,用汉英、英汉的形式解释这段历史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以及官职等。他说研究过程中他特别重视历史地图集的运用。翻开早已发黄的民国时期著名地质学家丁文江的地图集,指着汉中说这里的褒斜道、定军山、阳平关,以及萧何月下追韩信、曹操两次临汉中、老将黄忠刀劈夏侯渊等等历史故事,可谓如数家珍。然后再翻开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东汉益州部分,仔细介绍关中至四川间的道路。这一页早已脱线,由此看出磊夫研究中付出的艰辛努力和劳动。一份耕耘一份收获,敦谓枉谈!在我们站着的地方,转身可以看到摆满了国内著名学者的研究著作,如陈直《史记新证》《汉书新证》,徐中舒《论巴蜀文化》、林剑鸣主编《秦汉社会文明》等等,不一而足。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在他的书架上还有我的《西北小江南——汉中》。如果说出书如生子,那么我在南半球的澳大利亚看到了我的劳动成果——“我的另一儿子”。

磊夫先生可以说是个“中国通”，他在用流利的英语交流的同时还能讲一口较为纯正的汉语，在阅读汉文文献时并不感到有什么困难，这大概是他几十年积累的功力所致。他撰写的研究中国的著作有：《东汉官职名称》(Official Titles of the Former Han Dynasty)；《后汉历史》(The Last of the Han, Canberra, 1969)；《中国的土地和人民》(China the Land and Its People, Melbourne, 1971)；《本世纪的中国》(China This Century, Melbourne, 1975)，等。

我们离开院子时，红旗在这里飘扬。

二、无处不有的图书馆

澳大利亚的图书馆可以说无处不在无处不有，其数量之多、藏书之众、种类之全都令人叹为观止。

澳大利亚国立图书馆(The National Library of Australia)：位于首都堪培拉伯利·格里芬湖畔。它的外观是一座十分普通的3层楼房，座落在蓝蓝的湖边，衬托蔚蓝的天空，从而显得十分抢眼。澳洲的建筑要么是深藏在绿树丛中，要么就是像这座图书馆一样本身就是一幅极好的油画。由于事先约好，一个略胖而精干的女主管陪同我们，了解了来意后，看老照片的保护，观东立部藏书，或许担心语言不通，她又安排台南艺术大学进修的黄静慧陪同。

国立图书馆收藏数千幅珍贵的老照片，最早者是19世纪的，下至近期，但并不是所有的老照片都是他们收藏的对象，那些具有一定政治、军事、经济和澳洲发展及其生活变化的老照片才是他们保护的范畴。这些老照片的保护由若干程序组成，一人把一关，每过一程序均建有详细的档案资料。然后交由下一个人完成下一程序。大致说来，老照片先编号，再粘接、装册、装架，所用材料基本上是特质的，由美国进口。近几年来我馆先后收集了澳洲弗兰克·莫尔、美国飞虎队在汉中、张佐周与西汉公路等数百幅照片，相继举办了“百年沧桑”、“功在千秋”展览，想来国立图书馆的这些做法对我们的保护利用无不裨益。

国立图书馆的东方部的藏书也堪称澳洲第一。它的藏书左是期刊，左是书籍，泾渭而分明。里面的光线似乎暗了些，但我们所到的公共图书馆之类，全是采用感应灯，人到灯亮，人离灯熄。在主管的帮助下，我查到了我的老师李之勤先生所著的《蜀道话古》等书籍，返回住处后即告诉给对蜀道的浓厚兴趣的贾大卫。为了加强文化交流，我特意给该馆赠给了汉中市博物馆主编的《石门——汉中文化遗产研究》2005、2006年和我点校的《栈云峡雨稿》，在那位女主管和李锐所长的友情提示下，我还工整地用繁体字签上字，只见女主管说：“中国的文字就是有趣，就是好看！”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图书馆：国立大学成立于1946年，由国会立法决定，是澳大利亚唯一的国立大学和国家研究中心。占地145公顷的美丽校园，雄厚的师资和卓越的研究能力，使该校成为世界顶级大学。它有澳大利亚最优秀的计算机设施，学生可使用计算机的比率也是澳大利亚所有大学中最高的。图书馆收藏了200万册、13000系列图书，并提供一系列服务，包括电子化信息服务。所有校内图书馆楼和校内网络均可进入URICA信息库及线上图书馆目录。我们下榻的宾馆不远处，就矗立着国立大学图书馆东方部。

这座建筑共3层，似乎不能再平常的建筑物。我们径直走进，不需要办任何手续，工作人员少得可怜，偌大的大厅内只是一两个人而已，而且他(她)们还埋头在电脑上专注地干自己的事儿。由于李锐教授的引导，我们登上了二楼的汉文书库。书库密密麻麻地摆着书架，中间是过道，两边靠窗户处有过廊和桌椅是供阅览者查阅抄录的。藏书应有尽有，什么汉文籍外文籍，什么大陆、香港、台湾，什么日本、韩国、美国，什么杂志和书籍，应有尽有，人在其中坐拥书城，自得其乐。我以较短的时间要浏览完所有书籍，那几乎是天方夜谭，无法实现的梦想，我也只能匆匆而观。不过令我惊讶的是，八九十年代出版的方志，搜集之完整恐怕连国内图书馆也无法媲美，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市志、县志、区志，几乎没有遗漏。就我熟悉的陕西部分，关中、陕北各县市均有，而陕南以及我所在的汉中各县志如汉中市志和宁强、西乡、略阳、勉县、南郑、城固和洋县等，也一本不差。毕竟新志是一个地域历史与现实各种信息的总汇，从中可以看出历史的演变与现在的状况，国立大学花此力气搜集，可见其藏书精到之处。著名学者如季羨林、启功等人的著作，现代作家的作品如王蒙、张贤亮等人也几乎搜集无遗。当然我最感兴趣的石刻碑帖等方面的书，除《北京图书馆藏历代拓片》等数种而外，有关石门石刻、西安碑林等陕西的石刻资料，则基本不具。

澳大利亚的图书馆无处不有并非虚言。在科学工业组织，我看到了无比醒目的图书馆，因时间关系而错失一读。不过据经常出入其中的李锐教授讲，只要去办个阅读证，便可随时进出阅读、借阅。在堪培拉唐人街旁的Dickson社区，也有极为丰富藏书的图书馆。图书馆是一个地域文化的标志，也是提高国民素质的重要场所。在澳大利亚随处可以看到各式各样的图书馆，而且出入图书馆十分便利，几乎不需办理任何手续，来去自由。一般馆内藏书丰富，可供各类各层面人士阅览。值得注意的是，每座图书馆都配备电脑，方便读书人；且建有自己的网站，随时上网查阅，可见其现代程度之高。可以说澳大利亚是一个书的国度。

三、国民教育的乐园——博物馆

澳大利亚国立博物馆(National Museum of Australia)位于首都堪培拉伯利·格里芬湖畔的艾克顿半岛,与国立大学相邻。2001年3月11日,该馆建成对外开放,并作为纪念澳大利亚成立联邦100周年纪念活动的一部分,它是澳洲目前唯一的大型国立博物馆。

博物馆是公益性单位,该馆宗旨是探究过去、启发现在、设想未来。建筑主体是巨大的“澳洲梦想”造型,用五颜六色的外墙来装饰,在阳光照射下,显得格外醒目。2001年,该设计曾获世界最佳公共建筑奖——“蓝图建筑风格奖”。2005年被命名为“澳洲最佳主要旅游景点之一”。该馆有19万多件藏品,馆内设有5个永久性展厅:“永恒”、“澳洲最初的居民”、“地平线”、“国家与民族”、“古老的新大陆”,分别按照各自的主题展示了土著人早期在这块大陆生长繁衍的历史、欧洲白人移居澳洲大陆史、澳大利亚联邦成长史,还收录了50位历史上杰出澳洲人的故事。整个陈列用国家的象征、民族的精神这条主线来贯穿,主题十分突出。值得一提的是,整个展厅有65处应用互动式高科技声光多媒体技术的展示设备,极便于游人参与。国立博物馆可以说是澳大利亚国民教育的乐园,也代表着历史文化发展的形象。

悉尼动力博物馆(Powerhouse Museum):所谓动力指的是电车供电系统。该馆位于商业繁荣的悉尼,分电力、新工业时代和澳洲历史三部分。它是在1899年原有电车机房的基础上改造成的,澳洲政府曾投资2300万元改造,增加了展品,改善了陈列。但近年来,政府拨款越来越少,除靠门票补充经费不足外,公司与社会捐款捐物也是很重要的补充途径。

巴瑞玛家庭博物馆(Berrima District Museum):位于巴瑞玛古镇,一般游人不大会注意,因为它的位置僻在一边。从外面看也是座简易平房,但陈列品十分丰富,它是由收藏爱好者捐献,由家庭协会举办的。里面的陈列尽管比不上国立博物馆那样精细,但展示手段多样,

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Australian War Memorial):澳大利亚人似乎对战争与军事冲突有种异样的嗜好,每逢战事均积极参与,八国联军入侵北京,第一二次世界大战,还有近年来的阿富汗、伊拉克战争,这一系列战事每每都有澳大利亚军人的身影。就在我们访问时期,霍华德总理宣布向阿富汗增派300人的士兵,目的在于进一步打击塔利班的袭击。在游历过的悉尼、堪培拉,还是在像巴瑞玛这样的小镇,都有战争纪念碑。在堪培拉,我特意参观了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

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于1941年正式对外开放,它是由查尔斯·宾(Chares Bean)倡导,意在纪念与缅怀为国捐躯的澳大利亚将士们的地方。这座纪念馆建于山脚下,与议会大楼遥遥相对,中间是宽畅的绿荫大道。堪培拉是在一片荒地按规划蓝图建立的,因此城市的中轴线十分明确。战争纪念馆大门像H形,进入之后,映入眼帘的是纪念场,其中央是沉思池,两侧长廊上镶嵌着澳大利亚阵亡将士们光荣榜,镌刻着102000个捐躯者的名字。叫我奇怪的是,光荣榜前面赫然列有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时,澳大利亚军人“牺牲”的6人名单。明明是侵略中国,却说是为国捐躯的将士,真令人匪夷所思。沿台阶而上,是穹顶高耸的悼念厅,厅内是无名将士墓,也是历次战争的纪念公墓。主楼的博物馆陈列室,展示了历次战争经历,征集了如照片、影片、绘画、雕塑、军用设备、制服、官方文件以及信、日记等,其展品之多令人惊异,全方位展示了澳大利亚所有参与的战争和军事冲突。主楼后翼最高展示空间为澳纽军团(ANZAC),以声光表演午夜袭击,重现了1943年重型轰炸机奇袭德国的场景,另外还陈列3架德国飞机和1门高射炮。

在我们参观的博物馆中,并不是所有的博物馆都是免费开放的。在澳大利亚,博物馆是公益性单位,被称作公用设施,因其资金来源的不同而确定免费参观与否。如国立博物馆、战争纪念馆,这是教育国民牢记吾国吾土吾民的最高场所,又是联邦政府拨款资助,因而对中外游人则免费开放。它们可以说是澳大利亚教育的理想乐园,也是对外展示的最佳文化品牌。悉尼动力博物馆,因政府逐年减少拨款金额,为了维系其正常运转,所以适当收取门票费用(10元,相当于60多元人民币)。巴瑞玛的家庭博物馆,因是展示个人收藏品,因而也收取一定的参观费用。尽管如此,每座博物馆均花很大的力气,收集重要的展示品,拥有十分丰富的藏品;每个馆均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展示,观众与展品之间没有距离,观众可以随其设计而参与其中,同时还免费提供各式各样的宣传册页或相关的简介。所以澳大利亚的博物馆游人络绎不绝,显得格外热闹。我们访问期间正值澳洲放假两周,各博物馆青少年在父母亲的带领下,显得十分突出。各个博物馆都设有咖啡厅等,每位观众均可找到一种舒适的回家的感觉。看来博物馆的生存,政府养也好,少量拨款也好,还是私立的,陈列品的收集、精心的策划设计、多方面的宣传介绍,是缺一不可的重要工作。那种灌输式、高居象牙塔尖式的博物馆教育方式,只能让博物馆门前冷落鞍马稀,其结果只能是举步维艰了。

四、特殊的悉尼湾井盖

作为澳大利亚最大的城市，悉尼代表性城市建筑很多，众所周知的歌剧院无疑是其中的代表。它建在贝尼朗岬角，洁白晶莹半弧尖耸的外形，与悉尼湾水域、铁桥互相映衬，不免让人勾起了浪漫的回忆。当然我身在悉尼湾，视角上的美感让人享之不尽，沿湾的土著、乞丐的各式造型与表演，令人联想到澳洲的社会。不过，叫我最为感动的不是这些在各种媒体与各式图书上所看到的有代表性的建筑，也不是因悉尼湾所感受的澳大利亚的社会缩影，而是我无意间注意的沿悉尼湾的一方方井盖。

城市化是全球发展演变的一大趋势，各国的城市也是各式各样，但作为城市重要的小零件——却是不可或缺。说到底井盖是城市下水管道、排泄管道所必备的，各种降雨或者污水通过这个管道排泄，避免城市内部的洪涝灾害。地面的井口是流淌入水之口，也是维护的出入口，它的实用功能可见一斑。当然为了安全起见，平时必须用盖子覆盖，以防发生异外伤人事件的发生。在我所在城市里，井盖往往是铁制或钢制，标明制作的单位和时间，后来我也曾赴欧洲访问，井盖也列入我考察的范围，但欧罗巴的井盖与中国的井盖，区别还没有多大。但一想在悉尼湾所看到的井盖，感受到的澳洲文化符号与情结，却是让我回味无穷的，迄今难以忘怀。

悉尼湾的井盖有什么特殊的？其实这些井盖与其它国家的井盖区别也不是十分明显，形状都是圆的，它的金属制的井盖上鑲了金，我想这并不是澳大利亚显示其富裕，而是从视角与美学上要达到的与周围环境的协调；它的实用功能也是排泄、维修等。我的特殊在于加入了澳大利亚的文化符号，井盖上镌刻着澳大利亚或者与其有关的著名作家的名言名言，它的形式是作者姓名呈弧形，其名言名句呈直线形，下为作品名称与写作年代，下为生平简介及作品风格，最后是制作单位——新南威尔士艺术部——作家大道。语言自然是英语。请我们仔细看：

A·B·班旧·帕特森(1864-1941年)，井盖用的是1902年《那真是太美妙了》中一段话：“要是我不用工作，悠闲地躺在这里，睡上一整天，醒来后接着再睡，那真是太美妙了！”然后介绍他是小说《来自雪河的人》的作者，1895年出版第一部诗集，其作品包括诗歌、芭蕾舞剧、三部小说和其它一些散文。且注明班旧是音译，它的意思是班卓琴，为一种乐器。

亚历克·德温特·荷普(生于1907年)：“但是有些人和我一样，满怀喜悦，从茂盛的现代思想的丛林中回到家中，却发现人类思想如阿拉伯的沙漠般荒芜。他们满怀希望，以为会有先知从沙漠中走出。然而，这片荒芜中只能长出野蛮、赤红，绝无绿色的荒山。一些人逃离了充满学问的疑惑，还有那受过教育的猿猴的吱吱叫声，这声音在那被称作文明。”(1939年《澳大利亚》)他的诗歌遵循了古典诗歌的范例，恪守传统韵律和音节，继第一部作品集《流浪的岛屿》之后，大量的作品证明他是一个才华出众的散文家、讽刺作家与性爱诗歌的拥护者。

贝利·哈佛瑞(生于1934年)“我想我永远都看不到一首像馅饼一样可爱的诗歌，就像盛宴上的一道主菜，涂满了发着红光的西红柿酱。”(1991年《被忽视的诗歌和其它生物》)他生于墨尔本，著名散文家、讽刺家、艺人和诗人。1955年塑了著名的不道德人物形象——爱德娜·艾弗里奇，之后又塑造了姗迪·斯通、贝利·麦肯奇、莱斯·帕特森及其它很多人物形象。所有这些都讽刺了城市中产阶级空虚的特质享乐主义和虚伪生活。

大卫·威廉姆斯(生于1942年)，“在墨尔本，所有的人生观都同样令人沮丧，因此有没有人生观都无所谓……在悉尼，没有人浪费时间去争论生命的意义——这么做就像是得到一块只有水而有的空地。人们终生致力于追求。”(1987年《绿宝石城市》)是20世纪最著名的剧作家，生于维多利亚，作品有1973年《当的聚会》、1980年《加里波里》和1983年《法·莱普》。

亨利·劳森(1867-1922)“每当城市的黄昏，雨滴落在地上，我就会看见斯威尼的幻像，他看手拿酒瓶，背后是狂风暴雨的夜晚，和酒吧的柱子。我一直在想：为什么他浮现于我脑海中的次数远远超过其他鬼魂。”(1983《斯威尼》)他是挪威人后代，生于新南威尔士，其诗歌充满幽默、伤感和悲剧性的生活景象，不管是身在都市还是丛林。

肯尼斯·施奈舍(1907-1971)“红色的光之球，绿色的烈性酒，跳动的箭头，飞腾的火焰，你说它很丑陋，我认为很可爱。幽灵般的裤子，像被绞死的人一样晃动，在当铺的窗户里相互撞击，但其中却没有受罪受罪的人，你说它很丑陋，我认为很可爱。”(1939年《威廉大街》)他是著名新闻工作者，战地记者兼诗人。他为惧、逝去的友人而于1939年作的挽联《五个铃当》是其代表作。

费斯·班德勒(生于1918年)“蓝色的天空融入无尽的大海，事情一贯如此，万物皆为永恒，月亮来了又走，走了又来。太阳每天都会升起。当带来大雨的乌云遮住阳光时，我们无需多虑，甚至无需注意，因为太阳终究会照常升起。”(1977年《瓦克威》)此书是一部关于1883年被奴隶子带到瓦奴申岛的神父的传遍。她一直致力于修改宪法，组织民权运动，略给予澳洲土著居民平等的公民权。

上述基本上是澳大利亚作家，包括诗人、戏剧家、散文家和小说家。不过制作者还重视与澳大利亚相关的著名学者，如美国著名小说家马克·吐温、杰克·伦敦等。请看：

詹姆斯·米歇勒(生于1907年)“人类命中注定要生活在永远的灾难边缘，我们是人，因为我们要自下而上。就算我们要像驴子一样活着，我们也要活下去。”(1978年《契斯匹克》)他于纽约，以其古怪的虚构作品《南太平洋传说》开始了写作生涯，并获得普利策奖，并被改编为音乐剧，从而大获成功。人微言轻一个兴趣多样的作家，其最为人们熟知的11部历史小说，包括1959年《夏威夷》和1978年《契斯匹克》。

罗得亚德·吉普林(1865-1936)“在悉尼住着一大批悠闲自在的人，身着短袖，整日野炊，他们逢人就说：虽然我们岫轻轻，初来乍到，终有一天会做出一番事业。”(1937年《生平小纪》)他1891年到达悉尼，创作了大量诗歌和小说，包括两卷《丛林之书》，对班旧·帕特森等有着深刻影响。

马克·吐温(1835-1910)“纵观澳洲历史，从头至尾，都是如画，令人感到好奇而又陌生。这个国家的历史就是给我们最大的新奇。它不像历史，而像最美丽的谎言。一切是新鲜，绝无古老发霉的感觉。充满了惊奇和冒险，不协调和不可思议，但却如此真实。因为它们的确确实发生过。”(1897年《沿着赤道》)他原名塞缪尔·克莱孟斯，美国人，当过画家、水手和记者，1895年进行环球演讲时到达澳大利亚。

杰克·伦敦(1876-1916)：“我宁作燃烧的灰烬也不愿做尘土，宁作熊熊火焰中的一粒火星也不愿在干燥的腐朽中窒息，因为人的目的是生活而不仅是生存，我绝不会在时光浪费在延长生命上，而要过好生命中的每一天。”·美国作家、探险家，参加了1897年淘金潮，20世纪初访问了悉尼。1911年《南海故事》记录了他的太平洋之旅。

忆当时如更多观光客一样，我也是匆匆而来匆匆而去，拍摄的井盖只是其中一部分，未能反映全部。但由一点而全部，悉尼湾井盖的文化符号基本掌握在心。悉尼歌剧院无疑是20世纪人类的伟大建筑，也是值得澳大利亚人自豪骄傲的。这种自豪与骄傲来自于一种文化，来自于一种在贫瘠历史上创造的文化辉煌。制作者匠心独运，用大众熟知的实用设备上，铸造出澳大利亚文学的历史，不仅仅是宣传，不仅仅是撰写，而是一种对历史的尊重，对文学的传播，更是对文化的重视。